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0年12月4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组版：陈雪峰

刺泡

◎黄孝纪

江岸的小野果很多。比方说，小时候曾摘过野枸杞子吃。那些小小的灌木丛，枝条柔软如弧，努力探身水边。它们的柔枝长着密集的小叶子，状如米粒的枸杞子颗颗血红，挂满枝条，在绿叶的映衬下十分鲜艳。我们常连枝条一块折来，拿在手中既赏心悦目，又可随时取食，甜！还有一种不知名的小野果，也是丛生小灌木，那枝头的果子形状奇特，或长成一个日字状小圆柱，或长成一个田字，扁扁的，不及小指尖宽大。这野果尚绿时就能吃，成熟后金黄色，更甜，嚼起来脆脆的。

岸边最多的野果当属刺泡。在故乡，泡又叫泡节，种类繁多，其植株形状也迥然不同，大多能吃，个别的也不能吃，甚至不敢吃，比如蛇泡。蛇泡据说有毒，顾名思义就觉得恐惧。蛇泡的植株是匍匐在地的小草，无刺，细长的叶茎顶着三枚叶片，犹如裂开的鹅掌，碧绿如玉。它们牵牵连连，成片丛生在一起，没长蛇泡时，也是显得那样可爱。只是当一支支细嫩的长茎直直地顶着一颗颗指头大的蛇泡，犹如火般的红珠，明晃晃，就十分惹人眼，我们扯猪草时看到了，避之唯恐不及。相反，那些能吃的刺泡都令人亲近，尽管全都长满了针刺，常把我们的手脚脸面划出血痕来。

覆盆子是江畔最早开花的刺泡。料峭春寒里，它那棕褐色的还近乎光裸的枝丫间就绽开了繁花，一朵朵小指头那么大的白色小喇叭，像无数的星星。这时候，它的卵形叶片也才刚长出来，嫩嫩的，翠翠的，在春风里仿佛飘扬的小旗。覆盆子的植株大约算得上是灌木，一根手指粗的主干笔直长上去，一层层分出枝丫，高的能盖过人头。它的木质过于疏松，类似芝麻杆，这点显然与别的灌木乔木不同。覆盆子的主干和枝丫，全都长满了三角形的钩刺，枝干越大刺越大，靠近它得十分小心。

农历三四月间，是覆盆子的刺泡成熟的时节，满树满枝全是红艳艳的，粒粒饱满如珠，悬挂在叶间。相比江岸，村庄的周边山岭上，覆盆子更多，很多地方，都是一大片一大片地生长，这时候红得如同铺开的彩云，真是令人眼花缭乱，堪称壮观。我们常常是从家来拿了搪瓷口杯，搪瓷碗，奋不顾身钻进刺丛里采摘。尤其是那些差不多有拇指头大粒的，哪怕衣服裤子挂破，手脚脸面划出血口子，我们也要拼命设法弄下来。往往，我们是边摘边吃，猴尽现。吃得满嘴都是红红的汁水，甜，实在是太甜了！

江岸上的地泡也多。地泡是草本植物，不过我们小时候叫地泡树，高一两尺，丛生，枝干上密布着绒毛状小刺，叶片如裂开的手掌，看起来比较粗糙。地泡花洁白明亮，朝着天空盛开，如同一枚枚硬币，比覆盆子的大花多了。花大，结的果也大，就叫地泡。地泡也是由一支长满小刺的短茎笔直顶着，这与蛇泡颇为相似。地泡比覆盆子的刺泡成熟得晚，很多时候，还是黄色，未曾变红，就被人家摘了。因为地泡实在太太，太诱人，大的比一截拇指还粗。地泡红透之后，摘下来，里面是空的，也不能像覆盆子刺泡那样多汁，吃起来也没那么甜。

江岸边常常能看到一蓬一蓬的乌泡刺，又叫过江龙。乌泡刺是藤本植物，叶子大如掌，表面和背面有细微绒毛，枝条密布尖刺。在江流与溪水交汇的地方，乌泡刺长得更加茂盛，沿着岸壁攀爬，重重叠叠。有的溪涧上面，两岸的乌泡刺甚至枝叶交错，将一泓清水覆盖得严严实实。

乌泡是成串生长，一串少则数粒，多则数十粒。初时，有刀尖状的花托包裹，像紧闭的花苞。渐渐地，花托打开，露出一圈细嫩的花蕊，中央一颗玉珠般的浅绿泡儿，并没有覆盆子和地泡那样的花朵。泡儿渐大渐红，最后乌黑，成了真正的乌泡。这样黑珍珠般的一大串，在绿叶的映衬下，圆润光洁，最为可人！

摘乌泡吃的时候，正值盛夏。我们到江边的稻田割早稻，或者从路旁经过，看到刺蓬上面那一串串亮晶晶的乌泡，就会手脚跟脚设法摘了来。乌泡味甜多汁，娇嫩易破，拿在手中，手掌手指都会染成紫黑。吃进嘴里，嘴唇嘴角都成了紫黑色，牙齿是黑的，吐出的口水也是黑的。倘使双手在脸上没一抹，顿时成了戏台上包公的黑花脸。

散文版精选

7
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
理想的孩子

◎葡萄

音乐声从教室传出来，声场就不一样了，粗犷的音响经了一道门、一道墙和许多空气，也好像被轻轻地滤了一遍，显出青春怀旧片里加了柔光似的电影感。穿练功服的小姑娘，两两坐在健身球上，身子随着音乐的节奏一摇一晃，不说话。谁也不知在想着什么，谁也不朝一旁的教室里瞄一眼。教室被挤挤挨挨的家长包围着，从抱着的羽绒服的缝隙里，偶尔露出一只胳膊一只脚，又在看不到的地方落下了，啪嗒，啪嗒。低头看手机的眼睛，老花的眼睛，健康而虚焦的眼睛，没有一只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不在舞蹈的队伍里。独自取乐的男孩子慢下了游戏的速度，跌坐在角落里，时间随着摇摇晃晃的白鞋子和绒绒的紫，静下了，来不及对任何一个人告密。

我盯着她们，想起1936年老舍笔下的“理想家庭”：七间平房、大院子无可挑剔的一妻一儿一女。“太太管做饭，女儿任助手——顶好是十二三岁，不准小也不准大，老是十二三岁。儿子顶好是三岁，既会讲话，又胖胖的会淘气”。不过，恐怕连这些好听话儿也不曾想到，自个儿竟能从几十年前的故纸堆一直吃进今天好些人的头脑身体，而依旧被喂养得生动鲜活。老是十二三岁的姑娘长不大，若是长大了，会不会有一天也会向父亲发问：你的理想怎么说的都是别个，不是自己？

我盯着她们，想到中国画里的婴戏图。可是她们比婴戏图要好，因为婴戏图里，无论是两小童逗花猫、“推枣磨”，还是百子嬉春、妇人浴婴，画的都不是作画人和看画人的欢喜；而她们是自己，此刻或坐或卧，全凭自己高兴，不必有幸入谁的画卷，代替任何衰朽的身体唤醒青春。上帝视角的人总是最可悲。正如《排班吧，爸爸》里那位父亲，不顾伤风败俗强迫女儿练习摔跤，看似是为了让她们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和自由；但当女儿们初尝平等自由后，却日益发现为她们打开新世界大门的父亲实际正是那道门本身，而它甚至从来没有敞开过。在桎梏之中，它并没有为生活带来更丰富更美好的可能，除非她自己走出去。

啪嗒，啪嗒，教室里跳舞的孩子不说一句。封闭的房间里从晨曦到余晖都是一样的日光。啪嗒，啪嗒，坐在健身球上的小姑娘不知何时闭了眼睛，好像不跳舞时音乐才走进心里，好像闭了眼才看得见比四壁更广阔的天地。一种让人羡慕的沉静，霜一样落在少年脸上，化了，渗进皮肤里，成为自己的东西。一个时代的焦虑与她们毫不相干。

曾经很不喜欢以儿童视角取巧的作品，以为那是种逃避。人人都熟悉那种从孩子到成人再到孩子的路：成人生活中不为所察、无从明讲、无力违抗的种种，以孩子之眼打量，的确另有一番诗意；但它的过度包装同时也使视觉模糊了，真正的矛盾反而止于懵懂困惑，成了没有出路的纠缠压抑，或是一种虚饰的释怀。不够诚恳，又缺乏真正成人式的反省与思考，孩子只能成为一个解决方案，一个理想的套路。而真正的举重若轻，是干脆回到孩子澄澈的心。它更像是某种文化变化，就连沟壑纹路也有其稳定的内在结构。做不到这些，只是哈着腰地借儿童的眼与口说自己想说的话，再精致细腻也不过是不堪重负下的奇技淫巧。

也许自我的发现与实现都是困难的，人才会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别人身上去发光。这个别人，若不能在现实中，就逃到想象去。单身汉佩索阿没有孩子，他的理想便分散在那些“不存在的名人”的投影里，以至于用“72个面具”为自己精心组织了另一套世界秩序，与他们书信往来，评论各自的作品，以不同的身世、个性、风格、立场分享着彼此的生命情境。卡埃罗、坎波斯、雷耶斯……他们于是也成为他的作品，另一种形式的孩子，并在他的诗集《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》中友情出场。他说，“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”。

音乐没有停顿，本就谈不上轻盈的啪嗒，啪嗒已显出疲惫和沉重，舞蹈老师的口令淹没在粗放的呼吸里，远得像听不见了。突然，一个姑娘站起来，说：“快下课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她们便轻轻地站起身，一溜烟儿地跑去了。只有健身球还在原地摇摇晃晃，每一个晃动都踩不到点儿上。

雪花

【第2376期】



牧归。苗青 摄

方言

◎彭家河

就有如此悬殊的落差，然而，在这个尘世间，还有许多远比口音更复杂和关键的差异，在生命一落地就已经注定。

我的方言对于我，只是不常有的一点点尴尬，然而，我的那些同村的伙伴和乡邻就远不止如此了。其实，我一直惦记着我的那些远在异乡的邻居和伙伴。他们与我一样，操着满口浓烈的方言，混迹于北京、深圳、天津、上海，他们比我更容易感受到方言带来的刺痛。在一个个满是普通话或者粤语的街头、车间、厅堂，突然冒出一声土得掉渣的异域的方言，我想，这绝对是一种被尴尬或者窃笑掩盖着的自卑或者歧视。我的兄弟姐妹、我的父老乡亲就在这样的话语大潮中屡受伤害并苟且偷生。

每年春节，外出的男女老少大都回村了，他们终于可以回家缓口气了，可以自由的说家乡方言了，可以解放一下被城市压抑的舌头，不必再硬着头皮卷着舌头说些阴阳怪气的话。在城市，我的兄弟们连说话的权力都被无形的制约，在南方或者北方，我的兄弟姐妹们成为机器的同一类。我们这个县的青年在广东等地多有作恶，传说成立了不少帮派，劫富济贫，以致不少当地人一听到我们这个方言口音，都会提高警惕，冷眼相对。是方言出卖了我更多善良的兄弟姐妹，他们要想轻松的寻找到一个看门或者进厂的职业，都比别的地方的打工者要难许多。当然，这也刺激了我们的伙伴们自觉学习别的方言的热情。

年复一年，有许多新鲜的词语和异域的方言被带回村子发芽生长。卷舌头的普通话，粗壮的广东话，娘娘腔的上海话，每年春节前后的乡村就变成了一个各地方言汇集的大超市，大家都交换着各地的方言，对比练习，交换得最多的是“我爱你”“您好”“谢谢”“多少钱”这些日常用语和最脏的骂人的话。一个春节下来，连村里不少小孩都能用三五种方言流利的骂人。年青的兄弟们为了免遭莫名的伤害，都在尽力的适应城市的声音，都艰难的扭动着声带，练习一些不明就里的发音，很短时间就能操一口当地的方言，入乡随俗，再也不容易暴露出自己的身份或者出生。就这样，他们迅速的隐匿于异乡，游刃在一个异乡语音的城市，谋求最多的钞票和最大的快乐。

早年，乡村学校里全是用四川土话教普通话发音的老师，全村没有一个学生能用拼音拼出正确的汉字读音，乡间还流传着不少经典的笑话，其中一个是关于“风”的。“风”这个字的拼音是feng，在乡村教师口中流出来就是这样的拼读：“f——eng——feng——fong”，在我们的方言中，eng是发ong的音，但是在中国的字典中根本没有fong这个读音的字。所以，从小，我们的教师就在试图把我们培养成外乡人。所以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个地球上难以落脚也是自然而然的了。这些小小的发音差异，不但难为了当年的教师，而且还深深的难为了老一辈从山里出来的孩子们，为了这些简单音节的转换，他们不得不忍受许多白眼和耻笑，不得不一再解释自己所说的词语。就是这些与生俱来的一个不异样的发音，让我的兄弟姐妹备受冷落，屡遭歧视。

我知道，在云南贵州、内蒙新疆，有不少男男女女从乡村走出来，如同洗去脚上的泥